

阿齐兹（Abdel Aziz Hamdi）是埃及知名翻译家和汉学的重要创立者，被誉为“中阿人民的友好使者”。阿齐兹现为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埃及高级文化理事会翻译委员会委员、埃及作家协会会员，同时担任世界汉学家理事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埃及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在近半个世纪的汉学生涯中，他始终专注于中文教学、汉学研究及翻译工作，为推动阿拉伯国家民众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杰出贡献，曾获中埃文化交流贡献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在中埃友好交往中迈上汉学求索路。阿齐兹的漫漫汉学求索路，始终是与新中国成立后日益密切的中埃友好交往分不开的，亦因此为埃及汉学的创立发挥了奠基作用，而被视为第一代埃及本土汉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埃友好交往进入新阶段，双方文化交流于1954年正式启动，每年互派留学生，同时中国向埃及派出中文教师，由此开启了当代埃及中文教学体系化之先河。1977年，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正式成立埃及第一个中文院系，阿齐兹是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招收的第一批中文专业本科生。阿齐兹回忆道：“那時候，在我們埃及沒有人學中文，也無人會說中文，自然不能滿足兩個國家友好交往的需要。所以，艾因·夏姆斯大學跟中國教育部簽訂協議，開設了中文系。我是該系的第十二個同學。”當時，給他們授課的並不是埃及本土老師，而是中國教育部派來的兩位中文博士，阿齊茲至今仍然記得他們。

（上接1版）中国主动汇入世界历史，成为世界性中国；世界则因中国的加入而真正开启世界历史的一体化进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个体利益的人类共生共存的命运共同体逐步生成，一个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化叙事开始了。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如何认识世界？这是定位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中国自身作为的基本前提。1978年邓小平访问了日本、新加坡等多个国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西欧五国。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增强，邓小平对时代主题作出新的结论。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个重大判断成为中国战略谋划，推动新型国际秩序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建设的基础性依托。中国彻底摒弃冲突、对抗、殖民、扩张的西方现代化的旧逻辑，向世界展示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现代化新图景、展开现代化叙事新逻辑。

把握住中华民族难得的发展机遇。如何认识中国在世界定位，第二次中西相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邓小平说，“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走进世界，走进全球化，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不可错失的机遇。我们必须融入世界、抓住机遇，踏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潮头，主动到世界浪潮中搏击。第二次中西相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觉醒与战略主动。

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邓小平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以科技和经济为内容的综合国力较量也日益凸显。要在世界的博弈竞争中取得主动，必须站上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而当时的中国“耽误了一代人的时间，影响了二十年”，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中国“人口多、国家大，有自己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树立雄心壮志，缩短这种差距。1980年中国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之后开放了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1988年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潮。1992

埃及汉学家阿齐兹：让阿拉伯世界更好认识中国

□ 胡燕春

阿齐兹在埃及国内学习中文一年之际，恰逢中国驻埃及使馆致函艾因·夏姆斯大学，可以提供选埃及优秀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前往中国学习一年的机会。1978年冬，他来到位于五道口的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自此，阿齐兹的汉学求索之路始终未曾脱离中国，多次前往中国拜师深造，特别是在学术导师北京语言学院李润新教授的指导下，先后攻读了中国现代文学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完成的硕士论文《丁玲和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博士论文《论柳青的文学创作道路》，在答辩中都获评为“优秀”。李润新教授认为，阿齐兹对中国充满了感情，是一位难得的文学翻译人才，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造诣较深。

得益于中国的悉心培养与文化熏陶和自己的发奋钻研，四十多年来，阿齐兹从最初的汉学门外汉，成为一名在阿拉伯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汉学家。

向阿拉伯世界宣介真实的中国。阿齐兹曾为中国学术期刊《国际汉

学》题词：如今汉学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在他看来，从事汉学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

中国形象一度在阿拉伯地区被简化为“中国制造”，阿齐兹对此忧心忡忡，希望用自己手中的笔助力筑牢中阿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翻译更多优秀中文书籍，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发展情况更多介绍给整个阿拉伯世界，让阿拉伯世界更全面地认识一个客观真实、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中国。因此他非常重视翻译的质量问题，认为，“翻译是桥，如果译作质量无法保证，就无法将中国的好作品送达阿拉伯世界，不仅有损作品本身，也有损中国形象”。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得到积极响应，中阿双方合作不断加强、人文交流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阿拉伯读者渴望通过文学作品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状，中国文学在促进中阿双边民心相通中的作用自是不可或缺。为此，阿齐兹选择翻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中国再认识再出发

人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一个人保持一种生活方式，如每天定时起床、每天定时运动，坚持20多天就会形成习惯，从刻意而为转变为自觉而为。“文化大革命”10年之久，对马克思主义和别国发展经验僵化的理解，以及对本国实际的僵化认识，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两个凡是”已然成为人们思考和实践的桎梏。邓小平充满忧患地告诉人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死，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中国要改革开放，要创新发展，要另辟蹊径，首先需要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一场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标志的轰轰烈烈的思想大解放，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今天，当我们复盘这段历史，追寻一个翻天覆地的新时代怦然崛起的密钥，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也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解放思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成为中国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新路的突破口。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简言之，政治是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破除“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束缚，把人们的思想从各种禁区中解放出来，是开启一条新路的基本前提，是中国最大的政治。1978年，邓小平在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三大反思、三条道路与三个再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在上个世纪70年代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主要取决于以下3点：一是取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二是取决于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三是取决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其中深刻的教训是什么？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开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如何尽快缩小差距赶上时

为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郭沫若的《蔡文姬》，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曹禺的《日出》《原野》，以及《田汉剧作选》《沈从文小说选》等。他还翻译了铁凝的《哦，香雪》，余华的《活着》，莫言的《蛙》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如今，在阿齐兹等阿拉伯翻译家的努力下，《论语》《老子》《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文化要略》等专著。除了翻译工作之外，阿齐兹始终不忘躬耕于汉学领域，研究内容涉及中国文史哲，撰写了《中国的尝试》《中国的穆斯林》等著作，编著了《中国作家小辞典》等工具书，这些成果在阿拉伯世界汉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成为阿拉伯国家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书籍。

致力于推动中阿文化交流与文明

代？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历史从来都是在多样性中开辟前进道路，在偶然性中实现其必然性。三大反思之后所面临的抉择同样不轻松，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远见，有三条道路：一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一是改旗易帜的邪路，一是新开辟的道路。何去何从？邓小平再一次显示了超乎常人的睿智，从思想的总开关入手，毅然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三个再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对资本主义再认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回到了事物的本来意义上，回到唯物主义的原点上。这样一场再反思、再选择、再认识，使他登上了社会主义的思想高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中国向哪里去，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深邃思考和伟大创造。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讲了很多，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等。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无不从生产力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是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其中最经典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两个关键词。

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从时代特征、世界发展形势以及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为重要的是“一二三”，即“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还有“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我们都要一心一意坚决扭住不放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技生产力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将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发展常态，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通过开放倒逼推进改革的深化和系统关联，也将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实践常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互鉴。阿齐兹在中国学习工作长达15年之久，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留下了他孜孜以求的勤学足迹，阿联酋驻华使馆、中—埃商务理事会映射出他不辞辛苦的忙碌身影。他热爱祖国，与一位中国姑娘喜结良缘，并将中国视为“第二家乡”。

越是深入了解中国思想文化，阿齐兹就越来越深切意识到，中华文化蕴含着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价值追求，民为邦本、仁民爱物的人本思想，天下为公、命运与共的世界情怀，使其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历经磨难而经久不衰，亦同时具有跨越时空和疆域的世界价值。越是深层接触中国现实，阿齐兹就越来越真切感受到，中国是如此的古老而又现代、如此的美丽而又丰饶、如此的广袤而又壮阔，她的每一面都展现出谜一般的色彩以及别样的深沉与厚重，而令人对她不能不情有独钟。阿齐兹持续关注着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对当代中国特别是新时代中国抱有别样的情感，始终坚定地与中国站在一起，多次参加由中国有关方面组织的国际汉语研讨

会、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一带一路”文学联盟、世界汉学家大会等交流活动，致力于推动中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针对美国学者亨廷顿关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因存在根本不同而会发生冲突的观点，阿齐兹予以了批驳。他认为，对中阿双方而言，从古已有之的丝绸之路到如今的“一带一路”建设，都是立足于不同时代的历史语境畅通中外文化交流之路、构建东西方文明桥梁，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这表明中阿双方始终保持着民心相通，在不断朝着更加团结合作的方向携手同行。在阿齐兹看来，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强调和谐、进步和发展，本质上都符合人民的利益而具有一致性，故而使得二者之间具备了对话沟通的无限潜能。

2023年7月，阿齐兹出席了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现场聆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的贺信，并在会上以《中阿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接受》为题发表主旨演讲，阐释了中阿文化之间的交往互通。阿齐兹认为汉学家得到习近平主席的关注和支持非常宝贵，汉学家要珍惜这份信任，发挥自身在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中的独特作用，着力把握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致力于推动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平实现了若干个理论创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形成若干个第一次表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标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共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方位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国两制；中国式的现代化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历史为邓小平留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结语

无论是否亲身经历过这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历史都会以最简洁的语言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是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学习时代。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年代，我们再一次触摸到历史之大江大河最坚硬的河床，被告诫那些朴素无华却是亘古不变的常识：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忌违背规律，天道幽远，道法自然。

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创造时代。摆脱禁锢，实事求是，自主思考，大胆创新，我们就能与时代同行、不负时代，时代造就人，人造历史。

这是中华民族的大解放时代。先是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走出来，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然后从“姓社姓资”的困惑中走出来，创新人类的市场经济新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艰难的跋涉。放下手中的锄头、榔头走进考场，曾让多少多年学荒废的青年人无助茫然；全民经商的公司热、生意热，使金钱关系迅速渗透社会的各个缝隙角落，一度使道德滑坡；价格体制改革，一时间官倒满天飞，价格闯关，引发挤兑抢购风潮……

唯其艰难，方显伟大。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在学习中、在创造中、在解放中、在艰难跋涉中，中华民族收获了解放累累硕果，积累了宝贵经验、物质基础和理论武装，而迎接我们的将是奔赴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壮阔的出征。

（作者系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原中央党校副校长）